

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视域下 第三次分配的理性逻辑：评述与思考

谢 琼 谷玉莹^{*}

【摘 要】将第三次分配纳入基础性制度安排有其背后的理性逻辑。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时期的本土缘起到新时代共同富裕目标引领下的理论探讨，学界对第三次分配的认识有基本共识也有诸多观点分歧。中西国家、市场和社会发展的不同演进路径决定了各自不同的国家—市场—社会关系。在中国式国家—市场—社会关系场域中，第三次分配从整体出发的理论逻辑、提升社会凝聚力的社会价值逻辑和运用社会机制动员多主体参与的行动逻辑，都有助于其进一步发挥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助力共同富裕的作用。

【关键词】第三次分配；国家—市场—社会；社会价值

DOI:10.16775/j.cnki.10-1285/d.2022.09.006

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既关系到经济的长远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社会公平和正义，更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稳定。^①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引起各界的广泛探讨和审视。第三次分配有助于分配正义的充分实现，相较于初次分配“基于生产要素的原始性”和再分配“基于整体均衡的强制性”而言，第三次分配可以称为“温良的自愿共享”。^②在新发展阶段，第三次分配被寄予厚望的理性逻辑是什么？国内研究认识的共识和分歧在哪里？本文试图通过近千篇文献分析，结合对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观察思考对以上问题做出探讨。

一、第三次分配研究的特点

不同于“第三次分配”实践形式发展的久远历史，“第三次分配”作为理论概念的提出是

^{*} 谢琼，北京师范大学民生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谷玉莹，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研究”（21STA002）阶段性成果。

^① 尹中卿：《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瞭望》2021年第37期。

^② 谢琼：《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 促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非营利评论》2021年第2期。

在20世纪90年代,此后,学者们相继围绕这一概念展开理论思辨。概念的产生或话题的热议都是现实社会情景的“镜像”,对第三次分配的认识和相关研究也脱离不了其产生和演化的历史背景。本文以有关第三次分配期刊文章的年度发表高潮作为节点依据进行分析,在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进行关键词搜索^①后发现,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第三次分配研究出现过三次发表高潮(图1),分别在2006年、2010年和2021年,^②从历史性上看这三次发展高潮呈现出不同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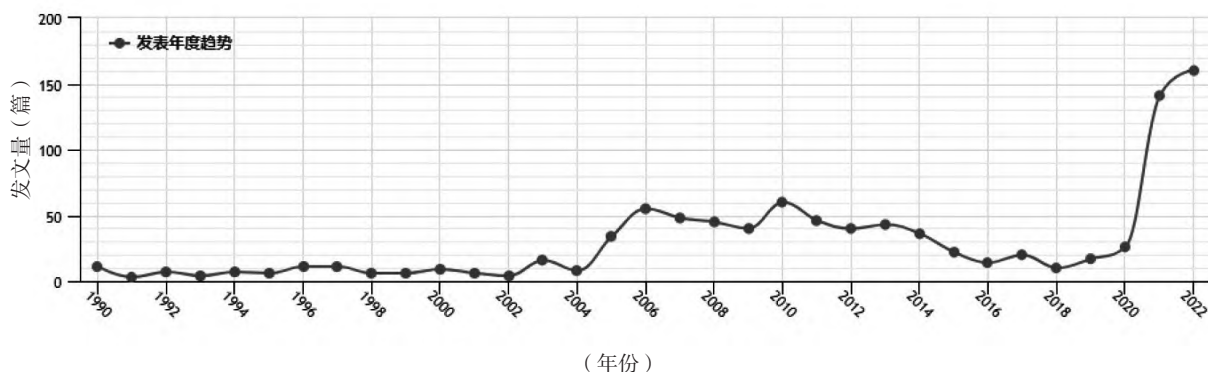


图1 第三次分配研究发展年度趋势

(一) 90年代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探索中的本土缘起

20世纪90年代初,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第三次分配概念正是学者们在经历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对现代经济伦理及经济发展道路问题的关照与思考,它的提出属于中国本土知识界的一种理论自觉与创新。^③1990年,已有研究中使用的“第三次分配”概念,是在国家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方案的探索中被看作资产收益的一种分配。^④而现在所研究的第三次分配是在厉以宁先生所提出的概念内涵基础上进行的。作为市场经济改革的倡导者,厉以宁在1991年的《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文中,首次论述了影响收入分配的第三种力量即道德力量,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进一步明确了“在两次收入分配之外,还存在着第三次分配——基于道德信念而进行的收入分配”。^⑤1999年的《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一书更是详细论述了习惯与道德作

① 文献总数: 972 篇; 检索条件: ((主题%='第三次分配' or 题名%='第三次分配') OR (主题%='三次分配' or 题名%='三次分配')) AND (年 Between('1990', '2022')); 检索范围: 期刊; 检索时间为2022年10月1日。

② 从发表年度趋势图看,2013年的研究数量有小幅上升但不作为发表高潮作详细分析;2022年数量为知网网预测值。

③ 罗叶丹、邓国胜:《共享理念视角下中国特色慈善理论的逻辑理路》,《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④ 金周英:《关于国家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方案的探索》,《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0年第3期。

⑤ 厉以宁:《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为超越市场与政府外的一种调节方式对资源使用与配置的积极作用。^①

(二) 2006年左右: 促进社会和谐呼唤

2006年左右,有关第三次分配的文章数量逐渐增多,研究者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下,^{②③}围绕国民收入分配层次、第三次分配的构成要素及范围、发展第三次分配的必要性以及分配对缩小贫富差距的影响等方面展开讨论,研究呈现出为概念辨析、必要性论证的特点。引起此次发表热潮至少有三个经济社会背景:一是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差距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等突出问题成为政府、^④学界^{⑤⑥}共同关注的问题。二是党的十六大之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的要求指引着实践发展,且在200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⑦三是国际上,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等富豪的巨额捐赠轰动世界,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受到了第二次国际慈善浪潮的直接影响,^⑧而在国内,政府对慈善的干预“缺位”与“越位”并存,慈善类民间组织的形成具有显著的行政派生性特征,^⑨慈善事业正成为一项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业。^⑩

(三) 2010年前后: 实践转型发展的需要

2010年前后,特大雪灾、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等应急事件中高涨的慈善热情以及常态发展下多样的捐赠资源和方式共同推促着我国公益慈善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一方面,社会各界的慈善热情在自然灾害救援过程中被迅速激发。仅2008年公民自发进行的慈善捐赠就突破了1000亿元人民币,^⑪自下而上的志愿者和社会组织的服务规模和强度让各界认识到了社会资源的力量和潜力。另一方面,日益多样的捐赠资源和方式也考验着我国的慈善行业实践,汶川大地震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中慈善资源统筹不善、青海玉树地震善款“汇缴”、股权捐赠“难产”等问题使得善款的处置与结转、股权捐赠与财产管理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等议题纷纷显

① 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② 宋林飞:《第三次分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学海》2007年第3期。

③ 林海、古太、邹巍:《和谐社会呼唤第三次分配》,《经济导刊》2006年第8期。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http://www.gov.cn/test/2006-02/16/content_201218.htm,访问日期:2022年10月7日。

⑤ 林海、古太、邹巍:《和谐社会呼唤第三次分配》,《经济导刊》2006年第8期。

⑥ 马晓娜:《完善第三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⑦ 中国人大网:《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szyw/zhbd/2006-05/29/content_349425.htm,访问日期:2022年10月1日。

⑧ 郑功成:《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与需要努力的方向——背景、意识、法制、机制》,《学海》2007年第3期。

⑨ 任振兴、江志强:《中外慈善事业发展比较分析——兼论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思路》,《学习与实践》2007年第3期。

⑩ 郑功成:《现代慈善事业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学海》2005年第2期。

⑪ 杨团、葛道顺:《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露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者们回应与总结现代公益转型实践中的问题与经验，^①关注社会发展和慈善事业发展为第三次分配创造的有利条件和基础，^{②③}围绕“公益慈善”本身及相应的税收、组织管理、政策完善等发表了不少文章，呈现出多学科多视角对第三次分配重点领域的微—中观研究特点。

（四）2021年以来：共同富裕目标引领下的理论探讨

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之后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共中央 国务院在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等前瞻性、规划性的重要会议和文件中相继提到第三次分配。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将第三次分配纳入基础性制度安排。第三次分配在新时代呈现出制度保障逐渐强化、分配形式愈益协调化、运作方式不断多样化、覆盖范围更加全面化等新变化。^④有关第三次分配的研究在2020年后出现井喷，研究者在政策引领下围绕如何发挥第三次分配对促进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如何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如数字化，促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等方面展开研究，呈现出多学科多视角的中—宏观研究特点。

二、第三次分配研究的共识与争议

如前所述，三十多年来关于第三次分配的研究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入，文献内容主要围绕第三次分配的内涵与外延、价值功能、实现方式、作用领域，以及与初次分配、再分配、慈善事业和共同富裕的关系等展开，涉及的学科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甚至哲学等，既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也存在许多不同认识，主要总结如下。

（一）基本共识逐渐明确

第一，研究缘起上，研究普遍认同第三次分配的概念在中国由厉以宁在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从经济学视角提出。第二，在目标导向上，研究者们普遍赞同发展第三次分配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正相关关系，是走向共同富裕必不可少的分配机制。第三，在基本特点

① 王守杰：《论慈善事业从传统恩赐向现代公益的转型》，《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② 武晓峰：《第三次分配：实现分配公正的助推器》，《经济问题》2009年第12期。

③ 陈晓枫：《第三次收入分配的基础和发展》，《闽江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④ 马雪松：《第三次分配在新时代的新变化、新利好》，《人民论坛》2021年第28期。

上,与初次分配、再分配相比较,第三次分配具有道德性、自愿性、民间性、公益性等特征,受到多数学者认可。第四,在内容上,普遍认为慈善事业是第三次分配的主体或主要实现形式,两者之间关系紧密。第五,在功能作用上,普遍认为第三次分配的社会机制可补充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不足,不仅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经济功能,同时有维护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和谐的社会功能、文化功能等,还与人类更高层次的价值需求有关,具有不可替代的道德功能,能够促进互助友爱和社会和谐。^①第六,在发展局限性和路径构建上,几乎所有研究者都认为目前以慈善为主体的第三次分配的体量和规模小,需要广泛调动慈善组织、企业、公众等多方参与,并且处理好初次分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的关系。

(二) 观点分歧依旧存在

第三次分配研究的多领域、跨学科、前沿性特征决定了从不同理论视域出发的研究观点不尽相同,认识分歧既源于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也源于研究者的见仁见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如何认识第三次分配

收入分配格局在市场主导的初次分配和政府主导的再分配之外还应存在分配空间,但如何界定第三次分配,以及是否有更多分配类型存在?学者们主要采取两种策略回应这一问题:一是在三次分配内寻求放大第三次分配的“新”和“广”,^②二是在框定第三次分配边界的基础上探讨其他可能的分配层次。

首先,是否超越经济学意义上的范畴探讨第三次分配。魏俊曾将界定第三次分配的代表性观点归纳为捐赠说、公益慈善说、转移支付说、社会资源重新配置说、制度和机制说五种。^③有学者认为,第三次分配已超出单纯的分配范畴,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④不属经济学意义上的“国民收入分配”,而是社会自治过程中资源的调剂。^⑤因此,主张跳出经济学思考第三次分配,用超越经济学的社会理性、人文理性和价值理性来面对第三次分配,要站在比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更高的维度上来探寻第三次分配。^⑥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三次分配能拟合国家—市场—社会三维分析视角,提出第三次分配能够体现收入分配层次的结构完整性。^⑦还有不同学者将“国家—市场—社会”分别看成不同内驱力、不同主导机制或不同场域,不同的理解出现了对

① 谢琼:《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 促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非营利评论》2021年第2期。

② 杨方方:《共同富裕背景下的第三次分配与慈善事业》,《社会保障评论》2022年第1期。

③ 魏俊:《“第三次分配”的概念及特征述评》,《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④ 江亚洲、郁建兴:《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与机制》,《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

⑤ 金锦萍:《第三次分配塑造具有志愿服务精神的民众》,《中国慈善家》2021年第5期。

⑥ 王名、蓝煜昕、王玉宝、陶泽:《第三次分配:理论、实践与政策建议》,《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3期。

⑦ 宋林飞:《第三次分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学海》2007年第3期。

第三次分配范畴定义的不同。^①

其次,是否存在更多的分配层次。一些学者认为,在三次分配外还存在0次分配、^②2.5次分配、^③第四种分配(如实物社会转移、^④关系分配^⑤)以及第五种分配(冲突分配^⑥)等。还有学者主张跳出单纯的数量之争,需要从再生产与分配的关联性以及分配的机构与功能上进行确认,公正分配的保障条件是规范市场、法治政府与良序社会。^⑦

总体而言,从个体上看,第三次分配是个人在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中获得合法财富后,再通过自愿向公益慈善组织或有需要的困难群体捐献款物或购买公益彩票等方式回报社会,是由道德力量或公益精神主导的社会成员之间互助友爱的集中表现形式。^⑧从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维度来看,第三次分配是促使资源和财富在不同群体间趋向均衡的微循环行为,^⑨是社会收入的转移支付。从长远来看,第三次分配可被理解为丰裕社会的财富流向如何适应个体精神追求和人民美好生活的命题,^⑩是对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方式的反思和超越。^⑪

2. 第三次分配与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关系

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基本分配制度框架下的三种分配方式如何分工配合激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一些学者主张第三次分配应当且只能是社会分配的有益补充,对调节社会财富分配格局只起有益的补充作用,^⑫过分夸大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实际上不利于第三次分配的发展。^⑬而另一些学者认为,第三次分配才是更为久远和根本性的资源分配方式,且古已有之;^⑭第三次分配能够发挥引领作用,在人类共生共在的风险社会中蕴含和指向社会总体运行方式演进。^⑮

在分配时序视角下,第三次分配有历时性,是对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后所得到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一种收入转移,是在政府调节之后,个人自愿把一部分收入转让出去的行为。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的第三次分配体现出鲜明的“共时性”特征:第三次分配是与生产活动、初次

① 杨方方:《共同富裕背景下的第三次分配与慈善事业》,《社会保障评论》2022年第1期。

② 姜奇平:《以0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互联网周刊》2022年第11期。

③ 谢鸿飞:《私法中的分配层次》, https://mp.weixin.qq.com/s/xE6qr1Lo_gUluHxoymfduA, 访问日期:2022年10月3日。

④ 余卫:《三次分配之外还有第四次分配吗》,《中国统计》2022年第1期。

⑤ 陈庆云:《公共政策十大理论问题再思考》,《中国行政管理》1999年第12期。

⑥ 陈庆云:《公共政策十大理论问题再思考》,《中国行政管理》1999年第12期。

⑦ 杨斌:《第三次分配:内涵、特点及政策体系》,《学习时报》,2020年1月1日,第6版。

⑧ 郑功成:《以第三次分配助推共同富裕》,《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1月25日,第1版。

⑨ 杨斌:《第三次分配:内涵、特点及政策体系》,《学习时报》,2020年1月1日,第6版。

⑩ 王名、蓝煜昕、王玉宝、陶泽:《第三次分配:理论、实践与政策建议》,《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3期。

⑪ 刘文:《论第三次分配的本质——基于他在性视角的阐发》,《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⑫ 郑功成:《以第三次分配助推共同富裕》,《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第11月25日,第1版。

⑬ 魏俊:《“第三次分配”的概念及特征述评》,《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⑭ 江亚洲、郁建兴:《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与机制》,《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

⑮ 刘文:《论第三次分配的本质——基于他在性视角的阐发》,《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分配和再分配融合共生、不分先后地进行,而不是完全按时间先后顺序展开;^①实践中三者相互交错、并行不悖,如有的志愿活动与初次分配同时发生,有的捐赠发生在再分配之前而获得税收减免。^②

3.第三次分配与慈善事业的关系

首先,多数研究者认为第三次分配不能简单等同于慈善事业,但行文中也往往将慈善事业与第三次分配同义替换展开论述。如将弘扬慈善精神、为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构建人人参与公益的慈善氛围、推进公益慈善事业的专业性建设、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推进公益慈善事业治理的现代化、强化公益慈善事业的公信力建设等作为第三次分配的路径,^③或第三次分配面临的问题关键还是慈善捐赠规模与结构两个维度的挑战。^④

其次,在范畴上,对于第三次分配是否包含慈善的全部内容以及第三次分配与慈善的关系还存在分歧。一部分学者认为慈善属于第三次分配但第三次分配不能限定在慈善领域,还应包含人们常引以为证的公益慈善与志愿服务之外的活动及安排。^⑤如培育民间互助组织、共享经济和集体经济,^⑥以及与财富的新用途、社会创新、里仁良知、道德情操、人文价值的实现和心灵精神需要等相关的活动。^⑦另一部分学者提出,第三次分配不能涵盖慈善事业:现代慈善事业实质上是一种以第三次分配为主体,且包含了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份额的混合型分配机制;^⑧慈善公益较之第三次分配概念更广、理念更高、作用更大、主体更广;^⑨在辨析慈善、公益、人道以及相关组合式表述基础上,第三次分配近似的组合式表达是“公益人道事业”。^⑩也有学者提出过社会捐款和慈善事业是属于“第二次分配”并具有与纳税和公共福利支出同样的性质的观点。^⑪

4.第三次分配与道德的关系

围绕第三次分配的内生动力,大多数学者会肯定第三次分配中的道德意蕴,但第三次分配是否由道德驱动还需要澄清。有学者认为道德是第三次分配的最初触发因素,提出在市场尚未形成与政府尚未出现前,习惯与道德是唯一一起作用的调节方式,只是在市场与政府参与

① 周绍东、陈艺丹、张毓颖:《共同富裕道路上的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经济纵横》2022年第4期。

② 杨斌:《第三次分配:内涵、特点及政策体系》,《学习时报》,2020年1月1日,第6版。

③ 白光昭:《第三次分配:背景、内涵及治理路径》,《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12期。

④ 邓国胜:《第三次分配的价值与政策选择》,《人民论坛》2021年第24期。

⑤ 王名、蓝煜昕、王玉宝、陶泽:《第三次分配:理论、实践与政策建议》,《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3期。

⑥ 周绍东、陈艺丹、张毓颖:《共同富裕道路上的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经济纵横》2022年第4期。

⑦ 王名、蓝煜昕、王玉宝、陶泽:《第三次分配:理论、实践与政策建议》,《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3期。

⑧ 郑功成:《以第三次分配助推共同富裕》,《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1月25日,第1版。

⑨ 叶正猛:《第三次分配不能简单等同于慈善公益》, <https://mp.weixin.qq.com/s/6ZIUNZC7QmC1xE-JVbu11A>, 访问日期:2022年10月3日。

⑩ 杨方方:《共同富裕背景下的第三次分配与慈善事业》,《社会保障评论》2022年第1期。

⑪ 唐钧:《不应该把慈善事业当成“第三次分配”》,《中国改革报》,2005年3月10日,第5版。

收入分配调节时，习惯与道德调节下的分配才成为第三次分配。^①第三次分配还被称为“看得见的道德之手”，^②能够实现社会财富的道德式转移，是社会公众自发的以分配正义和共同富裕为行动目标的道德实践活动。^③而有学者回应道，其实道德的出现要晚于人类第三次分配的出现，在市场与政府出现前的社会资源分配可能由习惯等诸多因素调节而非道德驱动，如今第三次分配的道德属性是后来被不断强化的。^④

5. 第三次分配的价值评判

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第三次分配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作用，是更强调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西方的评价标准是否能使用，是量化评价还是质性评价等目前尚存分歧。多数研究者强调第三次分配的经济价值，通常使用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财富基尼系数、城乡总体差距、地区绝对差距等指标来观测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和第三次分配的贡献，然而有学者提出，第三次分配的价值不仅仅限于物质资料分配领域，更重要的是在道德与精神层面功能，^⑤其促进互助友爱和社会和谐的功能是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所不具备的，但恰恰是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所需要的。^⑥与其说第三次分配是为了对分配格局进行经济意义上的调节，不如说是为了发挥其社会价值。^⑦

除以上共识与分歧外，此前研究还存在未涉及但应讨论的话题，如将第三次分配纳为基础性制度安排的理性逻辑是什么？“三次分配”与“第三次分配”是否有相异之处？中西方收入分配理论与实践第三次分配有何异同？以及第三次分配可能的失灵和负外部效应等。

三、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的理性逻辑

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深入探寻将第三次分配纳入基础性制度安排背后的理性逻辑，并从理论上、价值上和行动路径上理清发展思路。

（一）理论逻辑：从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整体性出发

良好的国家—市场—社会关系是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的基础，三者关系及其角色定位不清或不准确容易导致权责不等、界限不明等，进而造成实践主体预期不稳、无所

① 厉以宁：《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165页。

② 孙春晨：《第三次分配的伦理阐释》，《中州学刊》2021年第10期。

③ 孙春晨：《实现共同富裕的三重伦理路径》，《哲学动态》2022年第1期。

④ 江亚洲、郁建兴：《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与机制》，《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

⑤ 雷晓康、陈泽鹏：《迈向共同富裕进程中的第三次分配：价值、基础与进路》，《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⑥ 谢琼：《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 促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非营利评论》2021年第2期。

⑦ 郑功成：《以第三次分配助推共同富裕》，《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1月25日，第1版。

适从。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需要在理解我国的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合理推进。

西方的历史实践中,市场和社会作为独立、自主的力量一直维持着较大活动空间,与政府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在市场占据主线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政府与社会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出现。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将国家和社会—经济二元对立起来,主张国家干预最小化,让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自然运作。^①而社会长期处在教会的照拂之下,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洗礼后政权和神权分离,政府逐渐介入社会,1601年《伊丽莎白济贫法》的颁布标志着政府对社会部分责任的确立。随着19世纪后期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诞生,经济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福利国家的建立,国家责任不断扩张,直到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开始,新自由主义倡导发挥市场作用、增加个人责任,市场化浪潮复兴,在对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思考和探索中,“第三条道路”应运而生。

也正是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开始受西潮影响,从公民社会视角出发探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种种问题,社会中的权利意识逐渐萌发。但很明显,中国语境中的国家—市场—社会关系不同于从西方国家的成长经验提炼形成的理论。在中国,“国家”和“社会”不是一个像现代西方主要理论所设定那样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体,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无疑是紧密缠结、互动、相互塑造的既“二元”又“合一”的体系。^②在古代中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家国天下、国社合一。改革开放前,新中国为有效整合资源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将经济生产与社会保障功能集中于单位,形成“总体性社会”。^③改革开放后,市场与社会在国家释放出来的空间中得以不同程度的发展,研究者们则从不同视角用“行政吸纳社会”^④“人民社会”^⑤“第三领域”等理论阐释对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观察和思考。其中,“第三领域”理论认为国家和社会互动的“第三领域”才是我国社会政治转变的动力,而非社会自主权的逐步加强。^⑥

由此可见,与西方政府逐步介入社会的发展进路不同,在中国,市场和社会均为后天“开眼看世界”习得的“舶来品”,作为补足和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手段而发挥作用,形成了与西方结构比例不同的国家—市场—社会的关系。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社会和市场发展具有同一目的性,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提升生活品质。在这个关系场域中,市场机

① 黄宗智:《重新思考“第三领域”:中国古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开放时代》2019年第3期。

② 黄宗智:《重新思考“第三领域”:中国古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开放时代》2019年第3期。

③ 孙立平:《“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论改革过程中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探索》1993年第1期。

④ 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⑤ 王绍光:《社会建设的方向:“公民社会”还是人民社会?》,《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

⑥ 黄宗智:《重新思考“第三领域”:中国古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开放时代》2019年第3期。

制和社会机制发挥作用都需更好地处理与党政的关系，同时运用好社会和市场的手段，即市场在运作中要承担社会责任，弥合因商业造成的社会割裂与差距；社会机制运作也要尊重市场规范，调动市场积极性。第三次分配基础性制度的确认，就是要在以往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发挥社会机制的作用，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同时完善国家—市场—社会的中国式健康关系。

（二）价值逻辑：发挥社会价值提升社会凝聚力

第三次分配既有经济价值更具社会价值。从经济价值来看，第三次分配的经济价值与其他两次分配相比而言微乎其微。虽然统计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社会组织捐赠收入整体上呈稳步上升状态，来自民间的善款和服务在扶贫、教育、医疗、助残等基本民生领域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但社会捐赠占GDP的比重依然很小。社会组织捐赠收入和福利彩票销售收入加上志愿服务和其他个人慈善行为所产生的效益，占年度GDP的比重也不超过0.5%。因此，有学者认为，与其说第三次分配是为了对分配格局进行经济意义上的调节，不如说是为了发挥其社会价值。^①

从社会价值角度来看，首先，第三次分配是“温柔之手”，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刚性措施的不便，彰显和凝聚社会正能量，体现了其社会弥合的价值；其次，精细劳动分工、社会流动加速、利益分化加剧、诉求表达公开化导致传统共同体弱化，^②第三次分配为公众及各参与主体表达善心善意提供了渠道，利于社会成员建立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联系，^③彰显互助、团结等社会责任感，体现了其社会共同体建设的价值；最后，第三次分配倡导和动员社会力量自愿参与扶危济困、扶老助残、环境保护、志愿服务等社会建设，体现了其社会动员的价值。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国以要素低成本、出口导向型战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如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不确定性增大，成本洼地优势越来越不可持续，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受到制约，^④在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需要经济和社会之间循环，提高在快速发展市场经济发展中被破坏或丢失的公众安全感、社会信任感、社会凝聚力，^⑤激发民间社会活力、增强社会民众对未来的信心与预期。^⑥这正是第三次分配较之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优势价值和互补价值所在。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讲，将第三次分配纳入收入分配基础性制度安排，体现

① 郑功成：《以第三次分配助推共同富裕》，《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月25日，第1版。

② 戴洁：《统一战线与现代国家团结：以社会共同体为视角》，《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年第4期。

③ 江亚洲、郁建兴：《第三次分配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与机制》，《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

④ 张占斌：《国内大循环》，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9页。

⑤ 黄斌欢：《新发展格局下的劳动、产业与社会形态转变》，《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

⑥ 彭小兵、韦冬萍：《激活民间社会活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缘起、基础和治理》，《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着充分发挥社会动员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和治理创新能力的智慧。

(三) 行动逻辑: 运用社会机制动员多方主体参与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既是一个经济发展命题,更是一个社会关系命题。^①不论学者如何界定第三次分配,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背景下,其背后的理性逻辑就是运用社会机制进行社会动员。如何动员,需要体现统战思想,激活第三次分配参与主体的积极性。

第一,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稳定富裕群体信心,保护其合法权益的同时畅通参与第三次分配的途径。首先,要稳定预期,对于企业来说,它在初次分配中发挥着主体作用,承担法定责任、保障员工权益、诚信经营、依法纳税是其本职工作,设想如果初次分配的主体对于本职工作没有稳定预期,甚至恐慌,这不仅会影响第三次分配的参与,更会降低生产力效率,影响初次分配。其次,要畅通参与途径,富裕群体是有着更厚基础、更强能力的参与主体,其优势不仅在于财富积累,还在于创新能力、专业能力、资源整合和运用能力等,所以,相较于“比捐”,发挥其所长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更利于富裕群体可持续参与第三次分配。因此,要给先富群体吃下“定心丸”,在稳定其生产力的基础上制定规划清晰的第三次分配参与路径和规则,为富裕群体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提供条件。

第二,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积极培育、发展包括慈善组织在内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社会资源的链接者、社会服务的主要递送者,能够协助政府发挥动员社会资源、提供公益服务、协调社会关系等作用。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90.2万个,^②其中,登记认定的超1万个慈善组织^③又是慈善事业的主要载体,但慈善组织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组织公信力有待加强、组织培育有待加强、组织结构有待优化,^④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扶持。

第三,引导公众理性认识和参与第三次分配。首先,第三次分配不是道德绑架的理由,其参与主体是包括富裕群体在内的广大民众,参与形式也不仅限于捐款捐物,不论捐物捐行为还是捐智识,都要以自愿为基础;其次,第三次分配也不是坐享其成的理由,第三次分配只能在财富分配上发挥补充作用。公众理性参与不仅促进了社会资源在第三次分配中的流转,更重要的是增进社会弥合、社会动员、社会共同体建设等社会价值。

第四,关注互联网衍生的第三次分配新机遇。在数字时代,社会资源要素和链接方式普遍

① 王道勇:《社会团结:推动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5期。

② 民政部:《2021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https://images3.mca.gov.cn/www2017/file/202208/2021mzsyfztjgb.pdf>, 访问日期:2022年10月7日。

③ 央视网:《我国认定的慈善组织已超1万个 2020年慈善捐赠额突破2000亿元》, <http://news.cctv.com/2022/09/08/ARTIXkQ0tb3byEGS4FXROWn4220908.shtml?spm=C94212.P4YnMod9m2uD.ENPMkWvfnaV.544>, 访问日期:2022年10月7日。

④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10/afc0a05adb4242b49920c2251017205e.shtml>, 访问日期:2022年10月7日。

数字化，以社会机制为主导的第三次分配必然面对数字化选择。近三年来，每年都有超过100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互联网慈善。2017年到2021年，中国每年通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筹集到的善款已经从25.9亿元上升到了100亿元，占社会总捐赠额的比重不断上升。^①以公益慈善数字化为例，数字化不仅将各界各方参与主体和亿万爱心人士连接在一起，形塑了全新的公益慈善生态；还培育了公益慈善发展理念与实践模式的创新，催生出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公益慈善项目，都充分显现出了公益慈善数字化转型所具有的无限潜力，为公益慈善事业注入了蓬勃活力。^②但抓住数字化机遇还得各方主体协同努力，政府加快完善法律政策、慈善组织积极主动探索数字化运用、企业提供技术赋能等。

Discussion on Rational Logic of State-Market-Society Relationship: A Review and Thinking on the Third Distribution Studies

XIE Qiong GU Yuying

[Abstract] There is a rational logic of incorporating the third distribution into the bas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From the local origin during the exploration period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o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 under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there already are some basic consensus and many differences of opinion in academia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third distribution.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hs of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determine their different state-market-society relationship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style state-market-social relationship,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starting from the whole, the logic of social value to enhance social cohesion, and the logic of action using social mechanisms to mobilize multi-subject participation will help the third distribution further play its role in optimizing the pattern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The Third Distribution; State-Market-Society; Social Value

(责任编辑：朱瑞)

① 谢琼：《中国网络慈善的创新价值与未来发展》，《社会保障评论》2022年第3期。

② 郑功成：《为公益慈善发展插上数字化的翅膀》，《光明日报》，2022年9月20日，第2版。